

中国式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

张莉娜 吕祥伟¹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110)

【摘要】: 本文基于 2007-2017 年 26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从线性、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三个角度对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劳动力流动和财政分权均促进了经济增长, 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 表明从总体上来说, 财政分权抑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但以上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根据地区的差异和城市竞争力的不同而不同。另外, 就门槛回归的结果来看, 随着财政分权和暂住人口数的增加,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出“倒 U”型趋势。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12(2021)06-0015-15

一、引言

人口流动可以为一个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 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流动人口中有 90% 以上属于劳动力流动。人口流动为一个地区带来增长所需要的劳动要素, 同时也会刺激当地的消费, 拉动内需。近几年, 我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持续提升, 1982-2015 年间, 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 5 年, 同时流动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加(段成荣等, 2019)^[1]。表明流动人口可以为流入地提供更多高科技、高技能人才, 有助于改善流入地的劳动力结构, 另外人口流入还会引发人才集聚, 进而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有助于推动当地企业的创新, 促进当地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因此各地区政府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纷纷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劳动力流入。虽然我国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造成一定的阻碍, 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人们更加关注居住地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因此地区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异和公共服务差异仍然“激励”着人口流动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向某个地区进行流动, 该地区的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将会作为一个考量因素。研究表明, 生活舒适性在高学历者的区位决策中尤为重要(高春亮和李善同, 2019)^[2]。

而公共物品的提供离不开公共部门, 尤其是政府的作用, 而地方政府行为又受到财政分权这一政策体制的影响, 最终影响了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在适度的财政分权下, 由于“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 有能力且具有前瞻性的地方政府会选择优化当地公共服务水平, 同时地方政府在行为 and 政策的制定上又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约束, 保证了劳动力在合理的范围内流入, 减少了拥挤效应的发生, 最终为当地经济提供增长点。而过度的财政分权, 使得政府拥有过多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自主权, 地方政府可以采用更多的政策手段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这些地区往往经济发达, 且是产业集聚区, 政府可以提供

¹**作者简介:** 张莉娜(1990-), 女, 山东济宁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财政分权、人口流动、财税责任与民生幸福;

吕祥伟(1987-), 男, 吉林白山市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京津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及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研究”(20ZDA041), 项目负责人: 刘秉廉;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山东省美丽乡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问题研究”(18BJJJ04), 项目负责人: 辛波

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由于就业岗位较多，且提供的公共服务较好，吸引了过多的人力资本流入，在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也导致了当地交通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人均资源分配等问题，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研究财政分权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直观的探索政府的行为偏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的设计；第五部分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第六部分为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七部分为进一步分析；第八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鉴于所研究的内容，本文梳理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样本，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Braun (1993) 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幅度，进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在长期可以提高资本的积累，进而使得经济可持续增长^[3]。王桂新和黄颖钰(2005)通过对 1995-2000 年省级人口迁移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省级人口迁移(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力的迁入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达到了 15%^[4]。邹璇(2011)研究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劳动力迁移对物价、产出等造成影响，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5]。胡荣才等(2011)从长短期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短期内劳动力流动虽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流动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6]。樊士德(2014)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强弱性，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弱正效应”而非“强正效应”^[7]。史桂芬和黎涵(2018)研究发现人口迁移不仅可以在数量上改善我国地区之间劳动力供需上的不匹配问题，也可以在质量上改变我国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进而使得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可以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发挥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8]。张义和王爱君(2020)从环境污染对健康损害的角度，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得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空气污染抑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9]。但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例如杜小敏和陈建宝(2010)通过研究得出对于中西部一些人口流出大省，人口流出导致的人力资本的流失已经显著的抑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0]。毛新雅和翟振武(2013)对样本分为东、中、西后进行研究认为人口净迁移率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抑制了经济增长^[11]。李晓阳和黄毅祥(2014)研究认为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了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因而抑制了经济增长^[12]。李晓阳等(2018)探究了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在不考虑人口老龄化时，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抑制作用，考虑人口老龄化时，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13]。周少甫和陈哲(2020)对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得出人口流动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14]。另外还有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例如 Zhang 等(2003)认为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反之则并没有影响^[15]。李晓阳等(2015)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的抑制作用小于后者对前者的抑制作用^[16]。

既有文献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 Lin 和 Liu(2000)通过使用我国 28 个省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显著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17]。张晏和龚六堂(2005)使用分税制改革后的数据，也得出了该结论^[18]。谢贞发和张玮(2015)通过对实证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得出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等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19]。詹新宇和刘文彬(2020)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视角，对我国省级和市级两个层面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的影响较弱^[20]。还有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例如 Davoodi 和 Zou(1998)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财政分权显著的抑制了经济增长^[21]。Zhang 和 Zou(1998)通过我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同样认为在我国财政分权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22]。李文星等(2009)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分税制前和分税制后，并认为在分税制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

用,而分税制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23]。另外,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结论,例如李涛和周业安(2008)通过我国1994-2005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24]。殷德生(2004)认为过度的财政分权和集权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了经济发展差距,因此应该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25]。孙萌和台航(2019)认为最优的财政分权水平的确定应与各层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和产出弹性相匹配^[26]。

对将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已知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接下来对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即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等政府行为,进而影响到劳动力流动。夏怡然和陆铭(2015)通过研究认为劳动力人口会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是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27]。在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方面,虽然有学者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例如,平新乔和白洁(2006)认为在财政分权下财政激励显著改变了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地方政府不仅增加了公路建设部门的公共支出,卫生和医疗部门的支出也有适度的增加^[28]。高琳(2012)以财政自主权来衡量财政分权进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增加了居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但是通过增加公共服务资金的投入效率来实现的^[29]。杨刚强等(2017)经过研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财政分权增加了公共支出效率。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具有负向影响^[30]。傅勇(2010)研究认为财政分权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公用设施的供给^[31]。罗伟卿(2010)通过研究1996-2007年的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后得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事权负担加重,最终促使地方政府减少了公共服务的供给^[32]。元寿伟等(2016)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支出效率进行研究,同样认为财政分权显著的降低了基础教育的支出效率^[33]。在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面,刘建民等(2015)认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起到“竞次”效应,且随着财政分权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会越来越严重^[34]。丁鹏程等(2019)通过中国省级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正相关,同时也会抵消由于环境保护支出、排污费征收等对空气质量的改善^[35]。

通过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虽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均认为劳动力的流出不利于流出地的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会影响到政府行为,进而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而根据研究的样本量与时间的不同,学者们对于财政分权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表明劳动力流动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鉴于此,本文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在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考虑了政府行为的因素。劳动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劳动力流入一个地区,该地的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而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因此政府行为是研究劳动力流动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影响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体制纳入在分析范围,有助于更明确的分析政府行为是怎样影响劳动力流动,最终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第二,使用面板模型进行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确定,而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确定,可能对财政分权的水平和劳动力流动的多少有关,因此本文在对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时,使用面板门槛模型,以便更加直观的研究不同财政分权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第三,考虑了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入到本地,对本地的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否对邻近地区的经济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影响的结果又如何,本文对此使用空间面板回归方法进行检验。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因此劳动力流动会对一个地方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流动会对缩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收敛和减缓作用(段平忠和刘传江,2005;王德等,2003)^[36-37]。为了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劳动力流入到本地,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而通常情况下劳动力人口会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是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夏怡然和陆铭,2015)^[28]。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居民会根据自身对税收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选择所居住的地区^[38]。另外,除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会影响劳动力流动意向外,一个地区的环境状况也是人口进行流动时所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空气污染会导致劳动者健康的损坏,进而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张义和王爱君,2020)^[9]。尤其是对于中上层阶级人士而言,对环境污染问题更加敏感,环境污染会导致这部分人士外流(陈友华和施旖旎,2017)^[39],

而这部分人更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通常情况下，当劳动力流入某地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而这种集聚效应，会通过促进资源匹配效率和知识的溢出，促进当地经济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对邻近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劳动力流动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假设 2:劳动力流动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均与政府行为密不可分。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赋予了政府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自主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上的支配资源、调整产业结构的能力，因而可以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最终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财政分权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不确定，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水平对政府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过度的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拥有过多的自主权，往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达，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民生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更多的政策来吸引更多优质且低污染的企业进入，由于工作岗位多，公共服务较好，因此吸引了过多的人口涌入，造成了交通拥挤、住房价格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外，经济分权造成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导致财政缺口不断扩张，也逐步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供给能力(邓晓兰等，2019)^[40]。在环境方面，地方政府在“竞争激励”下，为了增加自身的财政收入，也会通过放松对环境的监管“以环境换增长”，引入更多高污染、高税收的企业，导致所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丁鹏程等，2019)^[35]。但是适度的财政分权，由于政府拥有自主权利相对较小，在行为 and 政策的制定上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约束，使得政府因为“晋升锦标赛”的竞争激励影响也较小，可以促使政府较多的关注民生性公共服务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劳动力的适度流入，使得劳动力流入造成的人口集聚中规模效应仍占据优势，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财政分权水平不同，导致的政府行为也会有所不同，进而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其它地区的财政分权导致的民生性公共服务和环境质量水平的不同，也会影响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进而影响了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邻近地区的财政分权也会影响到本地的经济增长水平，但财政分权可以通过影响政府行为抑制了劳动力流动，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假设 4:随着财政分权水平不同，政府行为也有所不同，导致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即存在门槛效应。

假设 5: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的相关行为，进而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四、实证模型设计

(一)模型的设定

1. 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模型的具体表达式为公式(1)。同时，为了检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是怎样影响劳动力流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在基准模型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劳动力流动和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项，具体的模型的表达形式为公式(2)：

$$\ln Y_{it} = \alpha_1 + \beta_1 FD_{it} + \gamma_1 \ln mig_{it} + \delta_1 X_{it} + \lambd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Y_{it} = \alpha_2 + \beta_2 FD_{it} + \gamma_2 \ln mig_{it} + \eta_2 JHX_{it} + \delta_2 X_{it} + \lambd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下标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 Y 为人均 GDP, FD_{it} 为财政分权, mig_{it} 为人口流动, X_{it} 为控制变量, λ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μ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等式 (2) 中 JHX_{it} 为财政分权与人口流动的乘积,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 使得系数具有可比性和更有经济学含义, 本文对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两个变量分别做了中心化处理, 即 $JHX_{it} = \overline{FD_{it}} \times \overline{\ln mig_{it}} = (FD_{it} - \overline{FD_{it}})(\ln mig_{it} - \overline{\ln mig_{it}})$ 。

2. 门槛效应检验。

由于财政分权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定是线性的, 也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 可能导致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同, 进而使得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另外, 劳动力流入的数量不同,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本文使用 Hansen (1999)^[41]开发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来研究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分别作为门槛值时,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具体的表达式为:

$$\ln Y_{it} = \alpha_4 + \lambda_{41} \ln mig_{it} \times I(FD_{it}^m \leq \gamma_l^m) + \lambda_{42} \ln mig_{it} \times I(\gamma_l^m < FD_{it}^m \leq \gamma_h^m) + \lambda_{43} \ln mig_{it} \times I(FD_{it}^m > \gamma_h^m) + \delta_4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ln Y_{it} = \alpha_5 + \lambda_{51} \ln mig_{it} \times I(mig_{it}^m \leq \gamma_l^m) + \lambda_{52} \ln mig_{it} \times I(\gamma_l^m < mig_{it}^m \leq \gamma_h^m) + \lambda_{53} \ln mig_{it} \times I(mig_{it}^m > \gamma_h^m) + \delta_5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γ_{mllm} 表示低门槛值, γ_{mhbm} 表示高门槛值, $I(\cdot)$ 为线性函数, 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 (1) 中相同。

3. 空间计量模型。

接下来进一步分析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此接下来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 来对此进行检验, 同时报告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具体的模型构建见式 (5):

$$\ln Y_{it} = \alpha_6 + \rho w \ln Y_{it} + \beta_6 FD_{it} + \gamma_6 \ln mig_{it} + \delta_6 X_{it} + \theta_1 w FD_{it} + \theta_2 w \ln mig_{it} + \theta_3 w X_{it} + \lambda_i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ρ 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wFD_{it} 、 $w \ln mig_{it}$ 和 wX_{it} 分别为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λ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选取 3 种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回归, 即 W1、W2 和 W3, 其中 W1 表示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混合权重矩阵, W2 表示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W3 表示基于 3 阶最近邻的权重矩阵。

$$W_{ij,2} = \begin{cases} 1/d_{ij}^2,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quad (6)$$

W2 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元素的设置方法如下：

$$W_{ij,3} = \begin{cases} 1, & j \text{ 为 } i \text{ 的 } k \text{ 阶最近邻} \\ 0, & \text{其它} \end{cases} \quad (7)$$

W3 基于 3 阶最近邻的权重矩阵元素的设置方法如下：

W1 矩阵元素的设置方法如下：

$$W_{ij,1} = f(w_{ij,2}) \times f(w_{ij,4}) \quad (8)$$

其中， $w_{ij,4}$ 为经济距离矩阵，具体表达式为：

$$w_{ij,4} = \text{diag}\left\{\frac{\overline{GDP_1}}{\overline{GDP}}, \frac{\overline{GDP_2}}{\overline{GDP}}, \dots, \frac{\overline{GDP_N}}{\overline{GDP}}\right\}。$$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PGDP)：本文选用人均 GDP 来表示经济增长，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减少异方差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2. 核心解释变量。

(1) 财政分权(FD)：

财政分权可以采用财政支出分权或财政收入分权来衡量。但由于财政支出分权大多来自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往往被限制了用途，导致政府拥有的财政自主权较小，所以使用财政支出分权来衡量财政分权尚存在争议(毛捷等，2018)^[42]。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表达式中各层级的政府财政收入均采用人均财政收入来表示，具体表达式为：

$$\text{财政分权} = \frac{\text{市级人均财政收入}}{\text{市级人均财政收入} + \text{省级人均财政收入} + \text{中央人均财政收入}} \quad (9)$$

(2) 劳动力流动(mig)：

鉴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调查的在人口流动中 90%以上都是劳动力的流动这一事实和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照胡荣才等(2011)^[6]和王婷等(2020)^[43]的做法，使用人口流动变量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理变量，并借鉴杨晓军(2017)^[44]的表示方法，用暂住人口数来衡量，并对其做对数处理。

3. 控制变量。

(1)地区开放程度(trade)。一个地区越开放,越会吸引人口流入。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一个地方的开放程度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的进出口总额越多,则这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2)产业结构(ID),一个城市的第二产业越发达,越可能导致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会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进而减少了当地的人口流入,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表示当地的产业结构;(3)人口密度(density),人口密度越大,就会产生拥挤效应,人均所到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减少,不利于人口流入。本文采用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表示人口密度;(4)相对房价(HP),通常情况下,人口向某个城市流动,会将当地的城市房价考虑在内,房价水平越高尤其是相对房价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流入,最终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使用张莉等(2017)的方法来表示相对房价,即使用城市的平均房价与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来表示一个城市的相对房价水平^[46]。为了数据的平稳性和异方差性,本文对地区开放程度、人口密度和相对房价做了对数处理。

由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属于直辖市,行政级别等同于省级,而本文所研究的是地级市层面,因此本文将直辖市样本予以剔除。另外,由于部分城市缺乏城市暂住人口数¹,因此将这些城市样本予以剔除,最后再剔除出一些数据缺失较严重的城市,最终得到 268 个地级市样本。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7-2017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对于个别年份统计年鉴中缺失的数据,通过查找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予以补齐,其它少数一些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予以赋值。具体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1。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符号表示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	人均 GDP 的对数值(元)	lnPGDP	10.410	0.682	4.595	12.579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城市暂住人口数的对数值(万人)	lnmig	1.900	1.448	-3.507	6.790
	财政分权	财政收入分权	FD	0.255	0.140	0.029	0.749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	ID	49.465	10.507	13.570	90.970
	人口密度	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的对数值	ln density	5.704	0.915	1.573	7.882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对数值(百万美元)	ln trade	7.094	1.970	-4.457	12.664
	相对房价	城市平均房价与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值之比	ln hp	-2.369	0.326	-3.907	0.494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由表 2 模型(1)的结果可以看出,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劳动力流动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除了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略有变化外,系数的符号并没有变化,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另外,为了检验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本文在模型(6)中引入了二者的交互项,且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减少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说明财政分权通过抑制劳动力流动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从总体上来看,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权,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锦标赛”机制中获胜,往往采用一定的政策手段

来增加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是财政分权下，政府将过多的关注经济增长上，而忽略了环境污染问题和民生性公共服务，进而不利于劳动力向该地进行流动，同时劳动力流到一个地区，会给该地带来劳动要素，因而会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就控制变量而言：(1)产业结构。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2)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人口密度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符合逻辑的，通常情况下，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由于存在个体的知识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进而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3)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出口贸易总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进出口总量越高，表明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高，所拥有的外资企业越多，外资企业在增加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不仅有助于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也有利于吸引更多优质的国内外人才，学习更加有效的管理经验，因此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4)相对房价。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是并不显著。通过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越好，会吸引更多的人流入，而流入的人对于住房的需求，也会拉高一个地区的房价水平。但高房价会增强劳动力家庭的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没有购房的、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周颖刚等，2019)^[46]。这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lnmig	0.022*** (0.007)	0.010* (0.005)	0.010* (0.005)	0.010* (0.005)	0.033*** (0.009)
FD	1.258*** (0.234)	0.791*** (0.181)	0.745*** (0.178)	0.745*** (0.177)	0.923*** (0.180)
JHX					-0.096*** (0.032)

续表 2

变量	(1)	(2)	(3)	(4)	(5)
ID		0.156*** (0.004)	0.018*** (0.002)	0.018*** (0.002)	0.017*** (0.002)
Indensity			0.032** (0.015)	0.032** (0.015)	0.033** (0.015)
Intrade			0.028** (0.014)	0.028** (0.014)	0.029** (0.013)
lnhp				-0.012 (0.021)	-0.012 (0.021)
常数	9.432*** (0.053)	8.662*** (0.070)	8.342*** (0.114)	8.313*** (0.119)	8.293*** (0.119)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644.44	970.65	869.22	813.80	759.06
观测值	2,948	2,948	2,948	2,948	2,948
N	268	268	268	268	268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回归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 POLS 和随机效应回归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其次，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将财政分权的指标更换为各地级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后重新进行回归。由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财政分权与二者之间交互项系数的符号均与基准回归一致，且均是显著的，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POLS (1)	POLS (3)	RE (2)	RE (4)	FE (5)	FE (6)
lnmig	0.045*** (0.007)	0.118*** (0.013)	0.096*** (0.016)	0.177*** (0.029)	0.011* (0.006)	0.028** (0.011)
FD	2.579*** (0.086)	3.345*** (0.157)	2.420*** (0.231)	3.243*** (0.319)	0.349*** (0.068)	0.417*** (0.088)
JHX		-0.267*** (0.042)		-0.317*** (0.084)		-0.038* (0.022)
常数	7.713*** (0.127)	7.712*** (0.122)	7.040*** (0.302)	6.991*** (0.292)	8.300*** (0.118)	8.273*** (0.121)
时间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6529	0.6594	0.4844	0.4869	0.8675	0.8677
观测值	2,948	2,948	2,948	2,948	2,948	2,948
N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三)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为了解决内生性，本文借鉴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47]的思路，将所有控制变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后再重新进行回归。表 4 给出了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旧为正向，并且交互项也为显著的负效应，从而也说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4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变量	(1)	(2)
lnmig	0.011* (0.006)	0.032** (0.012)
FD	0.728*** (0.148)	0.897*** (0.170)
JHX		-0.093** (0.038)
常数	8.330*** (0.122)	8.315*** (0.1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F	554.92	517.67
观测值	2,948	2,948
N	268	268

(四) 异质性检验

上文分析的是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平均效应，未考虑到异质性的影响，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等级城市之间，自然环境、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进而会导致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和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地区和城市竞争力两个角度，对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

1. 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首先将样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类回归 2, 分为东部地区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来研究不同地区，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分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东	中西
----	---	----

	(1)	(2)
lnmig	0.021 (0.015)	0.032*** (0.010)
FD	1.461*** (0.269)	0.729*** (0.193)
JHX	-0.044 (0.050)	-0.106*** (0.033)
常数	7.879*** (0.218)	7.938*** (0.245)

续表 5

变量	东 (1)	中西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F	500.33	539.62
观测值	1,177	1,771
N	107	161

由表 5 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而言，由于环境较好，经济较发达，就业岗位较多，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在增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拥挤效应”，政府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来满足更多的人口，导致人均资源的不均等、房价和交通成本的上升，不利于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就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作用来说，回归的结果也并不显著，即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虽然由于“晋升锦标赛”机制，使得政府更倾向于为了增加当地的经济增长而忽略民生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而抑制了劳动力流动，但对于东部地区的政府来说，由于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普遍较高，政府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较多，大部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且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入，不一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即在东部地区政府的财政分权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力流动，进而导致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从中西部地区回归的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的交互作用显著为负，表明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财政分权抑制了劳动力流动，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财政分权水平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因此政府为了增加经济增长水平，可使用的政策手段相对较少，使得政府不得不采用较为粗狂的方式，例如吸引更多的污染较为严重但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企业进入，使环境进一步恶化，另

外由于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加倾向于减少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的这些行为均不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入，同时这些企业多为一些中间产品的加工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也不能吸引更多优质的人才进入，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且高质量发展。

2. 分城市竞争力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2019 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城市竞争力的分类，将研究样本中的城市分为二线及以上城市（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回归的结果见表 6。

表 6 分城市竞争力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二线及以上城市 (1)	三线城市 (2)	四五线城市 (3)
lnmig	-0.012 (0.071)	0.035 (0.023)	0.026** (0.012)
FD	0.469 (0.561)	1.617*** (0.415)	0.798*** (0.223)
JHX	0.017 (0.144)	-0.118 (0.089)	-0.084 (0.067)
常数	9.237*** (0.553)	8.178*** (0.234)	7.684*** (0.253)

续表 6

变量	二线及以上城市 (1)	三线城市 (2)	四五线城市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F	198.77	366.5	592.44
观测值	451	692	1805
N	41	63	165

由表 6 中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二线及以上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中二者之间的回归结果为正，其中三线城市中的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为：二线及以上城市由于经济发达，

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且多为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在造成一定规模效应的同时，也会由于人口过多产生较为严重的拥挤效应，导致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人均公共服务的减少以及交通拥挤等问题，使得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最终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三线城市相比二线及以上城市来说，经济相对不发达，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同时多为内陆的中小城市，对人口流入的吸引与二线及以上城市来说较小，因此产生的拥挤效应也较小，表明对三线城市来说，规模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四五线城市多为西部或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经济相对落后，人口流入规模较小，不容易产生拥挤效应，尤其在落后地区，地方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迫切，最终使得劳动力流入更容易产生规模效应，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由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正，但在二线及以上城市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三线城市及四五线城市的正向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为：二线及以上城市相比于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来说，多为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包括一些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较大城市及各省的省会城市等，这些城市的财政分权水平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因此政府之间因“晋升锦标赛”导致的不良竞争较小，同时政府也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民生性公共服务和环境污染治理，也有更多的政策手段来吸引科技水平较高且低污染的企业进入，因此在二线及以上城市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对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来说，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相对较小，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政府会将财政收入更多的用来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较少的关注民生性公共服务，同时政府也有动机减少环境规制水平，用来吸引污染企业进入，虽然为当地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但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财政分权在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就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二线及以上城市、三线城市以及四五线城市中，劳动力流动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其中在二线及以上城市中影响为正、在三线城市以及四五线城市中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为：在二线及以上城市，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政府可以有能力和采取其他政策手段来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在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由于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同时财政分权水平较小，经济也不发达，尤其对四五线城市来说，多为经济落后的城市，财政分权使得政府更有动机减少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最终不利于吸引人力资本流入，因此减少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就回归结果来看，财政分权通过减少劳动力流动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门槛效应分析

不同财政分权可能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使用门槛回归的方法，来研究不同财政分权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不同劳动力流动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分别将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在进行门槛回归前，需要对门槛个数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 7，同时本文还给出了门槛估计与相应的置信区间图，见图 1 所示。由表 7 中 F 值统计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以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作为门槛变量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由图 1 也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确实存在两个门槛变量，表明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表 8 给出了门槛回归的结果。

从财政分权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入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倒 U”型趋势，即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此时劳动力流入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当财政分权水平在 $[0.082, 0.357]$ 区间时，劳动力流入量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当财政分权水平大于 0.357 时，劳动力流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小。可能的原因为：在财政分权水平较小时，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较小，政府增加收入和发展经济可使用的政策手段较少，激励了政府增加经济性公共服务，来吸引一些高污染、高税收的企业进入，虽然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水平，但不可避免的给当地带来环境污染，另外政府为了增加经济性公共服务而减少了民生性财政支出，环境污染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的减少，不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由于劳动力流入量较少，导致此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过高的财政分权，会使得政府拥有过多的财政自主权，这些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也可以采取更多的政策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入，由于就业岗位较多，民生性公共服务较好，因此吸引了过多的劳动力流入，造成人口集聚产生规模效应的同时，也会造成拥挤效应的增加，减少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以上分析可知，过高和过低的财政分权水平，均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只有适度的财政分权，才能较好的平衡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得地方政府较少的致力于政绩考核的竞争之中，较多的关注民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的人口集聚，减少了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居民生活成本，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劳动力流动作为门槛值的回归结果来看，当劳动力流动门槛值小于 2.05 时，即暂住人口数小于 2.05 万人时，此时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当劳动力流动跨越单层门槛时，即暂住人口数超过 2.05 万人时，此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表明对一个地区而言，只有劳动力流入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当暂住人口数增加达到双重门槛值 57.5 万人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仍旧是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区间[2.05, 57.5], 系数有所减小，表明由人口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开始显现，通勤成本上升，人均民生性公共服务的减少，均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也不利于吸引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入，最终减少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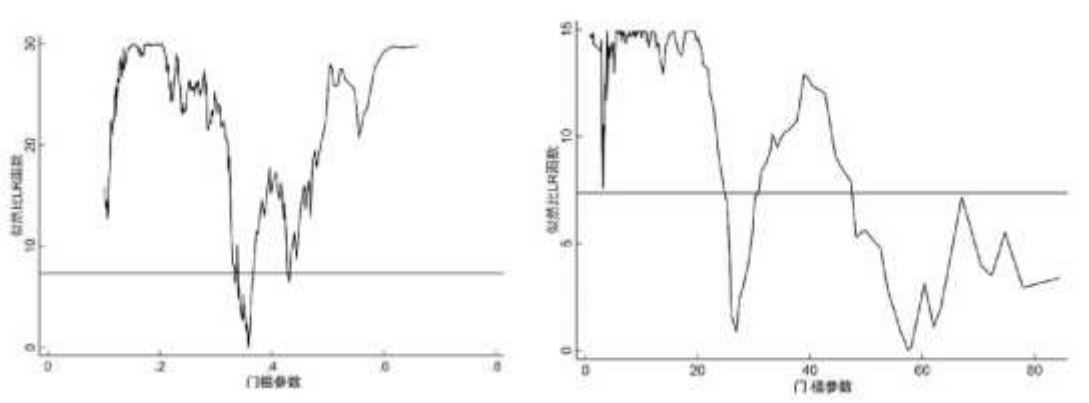


图 1 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值和以劳动力流动为门槛值的门槛估计量与置信区间

表 8 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财政分权 (1)	劳动力流动 (2)
劳动力流动 0	0.009 (0.021)	0.013 (0.024)
劳动力流动 1	0.162*** (0.009)	0.163*** (0.010)
劳动力流动 2	0.098*** (0.014)	0.132*** (0.011)
常数项	5.677*** (0.276)	5.673*** (0.2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F	375.11	367.38
样本量	2,948	2,948
N	268	268

(六)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由表 9 回归的结果可知， ρ 的值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在各城市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由于存在空间权重矩阵，导致回归系数并不能很好的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采用 Lesage 和 Pace (2010)^[48]的方法，采用偏微分的方式，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效应分解，即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具体见表 10。由直接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本地的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本地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由间接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邻近地区的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本地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的权重水平下，结果均一致，表明空间回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可能的原因：就财政分权而言，一方面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企业进入来增加政府的收入水平，倾向于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型公共服务的支出，使得周边地区的经济获益，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政府较少的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和民生性公共服务，促使劳动力向周边地区流动，从而有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劳动力流动而言，随着人口向一个地区进行流动，会造成人口集聚，可以提高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区域的创新效率提升，并且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表 9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W1	(2) W2	(3) W3
lnmig	0.010** (0.025)	0.010** (0.027)	0.028*** (0.000)
FD	0.554*** (0.000)	0.515*** (0.000)	0.711*** (0.000)
W*lnmig	0.045*** (0.003)	0.062*** (0.000)	0.051*** (0.000)
W*FD	0.315 (0.203)	0.294 (0.189)	0.306** (0.031)
ρ	0.834*** (0.000)	0.816*** (0.000)	0.686*** (0.000)

续表 9

变量	(1)	(2)	(3)
----	-----	-----	-----

	W1	W2	W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²	0.961	0.961	0.953
Log	1610.314	1588.919	1218.367
观测值	2,948	2,948	2,948

表 10 空间分解的结果

变量		W1	W2	W3
lnmig	总效应	0.335*** (0.000)	0.393*** (0.000)	0.254*** (0.000)
	直接效应	0.016*** (0.001)	0.020*** (0.000)	0.050*** (0.000)
	间接效应	0.318*** (0.000)	0.373*** (0.000)	0.204*** (0.000)
FD	总效应	5.217*** (0.000)	4.382*** (0.000)	3.234*** (0.000)
	直接效应	0.641*** (0.000)	0.608*** (0.000)	0.959*** (0.000)
	间接效应	4.576*** (0.001)	3.774*** (0.001)	2.274*** (0.000)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07-2017 年全国 268 个地级市数据，以财政分权为背景，从线性、非线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三个层面对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在线性层面上，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均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从总体上，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最终减少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在非线性层面上，本文使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当财政分权作为门槛值时，在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财政分权水平提高到[0.082, 0.358]区间时，此时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显现，当财政分权水平跨越 0.358 时，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大小相较于财政分权在区间[0.082, 0.358]时较小，表明在适度的财政分权下，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因此政府会将更多的收入用在民生性公共服务和关注环境问题上，另外，虽然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合理的范围内吸引人力资本流入，有助于减少拥挤效应的发生，最终有利于经济可持续且高质量发展。第三，在空间溢出效应层面上，通过空间面板效应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和劳

动力流动不仅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表明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制度，尤其是落后和欠发达地区，发挥其对吸引劳动力流入的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由人口流动造成的人力资本集聚，可以促进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集聚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向某个城市或地区进行流动，该地区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也是所考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本地，同时进一步放宽落户门槛，使得流入到本地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本地的教育和医疗，也促使这部分人口能够长期居住在本地，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第二，进一步优化财政分权制度，明确政府的责任。财政分权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政府行为，还可以通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间接的影响市场主体行为，最终传导到各地区计划外增长上(詹新宇和刘文彬，2020)^[20]。由于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由于“晋升锦标赛”的压力，导致政府“竞争到底”行为的发生，虽然有利于短期内当地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财政分权下，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地方政府用于汲取地方收入的方式较为有限，因此政府倾向于降低招商引资企业的环境标准，来吸引企业的进入，进而导致当地居民享受不到较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这些行为均不利于吸引人口进入，尤其是优质的人力资本，因此应进一步优化财政分权制度，明确政府的责任，避免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第三，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目前政府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目前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问题仍旧较为突出，城乡之间、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所享受的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环境服务等之间的差距较大，而公共服务，尤其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公共服务对劳动力的流动有拉力作用(周颖刚等，2019)^[46]。表明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公共服务水平较好的城市，更好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可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人才，无论对城市的发展还是就业者自身都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段成荣, 谢东虹, 吕利丹.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J]. 人口研究, 2019, 43(02):12-20.
- [2]高春亮, 李善同.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增长[J]. 财政研究, 2019(09):21-32.
- [3]Braun J.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migration[M].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4]王桂新, 黄颖钰.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 1995~2000[J]. 人口研究, 2005(01):19-28.
- [5]邹璇. 劳动力流动、区际变量冲击及宏观经济影响[J]. 南方经济, 2011(05):68-82.
- [6]胡荣才, 刘晓岚, 李伟. 劳动力流动、工业化进程对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视角[J]. 人口与经济, 2011(02):45-51.
- [7]樊士德.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吗——基于区域递归视角的经验验证[J]. 财经科学, 2014(01):61-70.
- [8]史桂芬, 黎涵. 人口迁移、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8, 34(11):174-175.
- [9]张义, 王爱君. 空气污染健康损害、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42(03):17-30.
- [10]杜小敏, 陈建宝. 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10, 34(03):77-88.

-
- [11]毛新雅, 翟振武. 中国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01):46-56, 127.
- [12]李晓阳, 黄毅祥. 劳动力流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36(12):91-100.
- [13]李晓阳, 赵宏磊, 张琦.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西部十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0(04):76-84.
- [14]周少甫, 陈哲. 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基于空间溢出角度的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6(02):49-59.
- [15]Zhang K.H. and Song S..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ScienceDirect[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4):386-400.
- [16]李晓阳, 林恬竹, 张琦. 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来自重庆市的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06):46-55, 127.
- [17]Yifu,Lin,Justin,et al.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000, 49(01):1-21.
- [18]张晏, 龚六堂.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05(04):75-108.
- [19]谢贞发, 张玮.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荟萃回归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5, 14(02):435-452.
- [20]詹新宇, 刘文彬.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03):23-39, 77.
- [21]Davoodi H ,Zou H 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Study[J].CEMA Working Papers, 1996, 43(2):244-257.
- [22]Tao, Zhang, and, et al.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7(2):221-240.
- [23]李文星, 艾春荣, 徐长生.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11):17-25, 125.
- [24]李涛, 周业安.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支出竞争和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08(11):3-15.
- [25]殷德生. 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 2004(11):62-71.
- [26]孙萌, 台航.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经济评论, 2019(05):3-21.
- [27]夏怡然, 陆铭.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0):78-90.
- [28]平新乔, 白洁.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 财贸经济, 2006(02):49-55, 97.

-
- [29]高琳.分权与民生:财政自主权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2,47(07):86-98.
- [30]杨刚强,李梦琴,孟霞.人口流动规模、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研究——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7(06):49-58.
- [31]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45(08):4-15,65.
- [32]罗伟卿.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经研究,2010,36(11):39-50.
- [33]元寿伟,俞杰,陈雅文.中国基础教育支出效率及制度因素的影响——基于局部前沿效率方法的分析[J].财政研究,2016(06):103-113.
- [34]刘建民,陈霞,吴金光.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72个城市数据的异质性与动态效应分析[J].财政研究,2015(09):36-43.
- [35]丁鹏程,孙玉栋,梅正午.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基于30个省份SO₂排放量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9(11):37-48.
- [36]段平忠,刘传江.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12):99-110.
- [37]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3(06):1-9.
- [38]Tiebout, Charles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416-424.
- [39]陈友华,施旖旎.雾霾与人口迁移——对社会阶层结构影响的探讨[J].探索与争鸣,2017(04):76-80,88.
- [40]邓晓兰,刘若鸿,许晏君.经济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J].财政研究,2019(04):23-41.
- [41]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2):345-368.
- [42]毛捷,吕冰洋,陈佩霞.分税的事实:度量中国县级财政分权的数据基础[J].经济学(季刊),2018,17(02):499-526.
- [43]王婷,程豪,王科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兼论新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转型[J].人口研究,2020,44(02):18-32.
- [44]杨晓军.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7(02):104-114,128.
- [45]张莉,何晶,马润泓.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J].经济研究,2017,52(08):155-170.
- [46]周颖刚,蒙莉娜,卢琪.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J].经济研究,2019,54(09):106-122.

[47]原毅军, 谢荣辉.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09):1340-1347.

[48]Lesage J P, Pace R K.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ing of Origin-destination Flow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48(5):941-967.

注释:

1 缺乏城市暂住人口数的城市为:青岛、长沙、株洲、深圳、湛江、潮州、三亚、三沙、毕节、铜仁、拉萨、西安、海东。

2 本文将城市按省份所在地区, 分为东部地区城市 and 中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